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70

新學術之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新學術之路

（上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印行

臺北 臺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新學術之路 (上、下冊)

主 編 杜正勝 王汎森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 50 巷 4 弄 21 號
代售處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3 樓
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出版

定價 精裝新臺幣 1200 元
平裝新臺幣 900 元

ISBN 957-671-608-X (精裝)

ISBN 957-671-609-8 (平裝)

新學術之路

樂學書局

PDG

序

路，是人走出來的。漫山遍野的雜草，有人帶頭走出一條蹊徑，後人跟隨，便成為大道。

民國十七年（1928），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創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奠定一個新學術的基石，指麾這股新力量的方向。這股力量匯聚起來，走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則是參與這個研究所的所有成員，以及所有的朋友共同營造的。

我們把這條康莊大道，稱作「新學術之路」。新，當然是相對於「舊」的一種概念，雖與時代先後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內涵。有人時代雖早，但內容卻極新穎，有人時代雖晚，內容反而陳舊。然而新往往是脫舊之胎，換舊之骨而成的。七十年前，傅斯年先生揭舉「舊域維新」而創史語所，七十年來這個所迭有更替，有其變易更新之處，亦有其堅持不變之處，但總在新學術的範圍內不斷探索，不斷地嘗試新的路子。

在本所七十周年慶的前一年，我們決定敦請走在這條新學術之路的人現身說法，搜尋他們的記憶，傳遞他們的經驗，好給後輩學者一些啓發。於是發函徵稿，籌備編輯這本《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徵稿的原則，基本上以傳主自己的回憶為優先，蓋亦寓含保存史料之意。然而本所既歷七十春秋，當時創所的第一代前

輩皆超過百歲，已經完全凋零；即使第二代人，碩果尚存者亦無幾何，能親身撰稿者更寥寥可數，我們乃委請其家人或親炙接聞之門生弟子執筆。這兩類文章，回憶、記敘性質比較大，但也有人評述自己學術歷程的原委，啓迪後學，甚可寶貴。第三條原則則委請研究領域相近的學者撰述，這類文稿往往理勝於情，帶有比較濃厚的學術史意味。最後，因爲一時覓請不到合適撰稿人，乃勾檢本所所藏檔案，略加編輯，以成篇章。

經過一年，我們共收到文稿八十六篇，傳主計七十七人。凡本所致送過聘書，不論專任、兼任或通信之研究人員，以及技術人員，皆算是本所同人，茲依年輩分成四代，第一代二十四人，第二代三十九人，第三代七人，第四代三人。另外本所的朋友四人。這些傳主編排的次序，第一代人以本所創立爲核心，依關係密切程度及參與本所之先後爲序；第二代人以抗戰開始分做兩期，抗戰之前進所者，可以說是「先進」，抗戰期間入所者是「後進」。先進、後進皆依本所組別加以序次。第三、四兩代基本上依入所先後排列；最後，本所的朋友則以與本所接觸之時間序次。

史料是靠研究者努力發掘才會「出土」的，這次編輯這本文集令我們深切領略此一道理。幸賴耄齡傳主的追憶，或親人與門生的記述，許許多多感人的故事，親切的經歷，敏銳的智慧，以及寶貴的經驗，乃得以傳之於世。我們覺得這不但是本所最珍貴的財富，也是學術界的共同財富，可供本所同人與年輕學子品味和思考，也可當作一面面的鏡子，鞭策自己日益精進。

己丑（1949）之變，本所第一、二代學者滯留大陸者不少，我們這次邀稿，聲明只記述己丑以前與史語所的因緣，他們在

己丑以後也許另有傑出貢獻，只好請求作者割愛。格於本書體例，我們謹對傳主和作者深致歉意。

史語所是二十世紀人文學新學術的重鎮，尤其在第二個二十五年（1927-1949），國內外重要的學者幾乎無不與史語所有所關涉，譬如歐洲第一流的東方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米勒（F.W.K. Müller）和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古地質、古人類學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德日進（P. Teilhard de Chardin），以及日本的梅原末治等人。可惜由於我們一時無法邀請到合適的撰稿人，以致無法在這裡表彰他們與本所的關係。中國學者，如馬衡、孟森、徐旭生、朱希祖、馮友蘭、許地山、袁復禮、丁山、商承祚、陶雲逵等亦然。諸如此類之缺失，使這本文集頗嫌美中不足，我們也感到非常遺憾。

不過，我們相信還有拾遺補闕的機會。路既然是人走出來的，應該愈走愈平坦，愈走愈開闊，愈走愈悠遠。相信隔一段時間之後，待《新學術之路》二集問世，這次遺漏的前賢不但可以獲得彌補，而且第三、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人，將可以在這條大道上樹立一塊塊的豐碑，標識著本所對人類學術的貢獻。

本所創所人，也是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開創了新學術的園地，同輩是他的同志，晚輩是認同他的理念的人，故本集封面題簽採集他的墨蹟，不但書法豪放有逸氣，而且意味深刻雋永，應是對最恰當的紀念。

這本紀念文集得以順利編輯完成，我們首先要感謝所有撰稿的作者，沒有他們的熱心支持，是無法與讀者見面的。七十多位作者，有嵩壽近百的前輩學者，也有不及而立之年的青年。我們尤其感謝本所前輩，高齡的勞貞一院士與全漢昇院

士，雖在體恙之餘，還給我們寫下那麼珍貴的治學經驗談。而石璋如院士，以蒼松翠柏之齡，不但寫自己，而且寫師長，寫朋友。他這種老當益壯的精神永遠是後輩學子的好榜樣。

本文集從倡議開始，所有的規畫，本所研究員王汎森先生皆躬與其事，舉凡連繫、催稿、讀稿、訂正和潤飾，無論巨細，他都爲我分擔大部分的辛勞。沒有他的編輯經驗與細心和耐心，本文集恐怕不能達到這麼高的水準。

本文集七十萬言，在短期內得以順利出版，也要歸功於本所助理之鼎力合作。負責文稿輸入者有郭佳蕙、王靜新、陳淑梅、王家容、王姝媚，以及羅麗芳、程鳳娟、李玉娟和李昌菁諸位小姐。秘書室助理林明雪小姐自發函邀稿就投入本書的編輯工作，協助主編處理一切庶務；編輯會助理蔡淑貞和陳靜芬兩位小姐負責後一階段的編輯、定稿和完版等重要任務；封面集字請本所編審湯蔓媛小姐負責。我對她們的工作能力和任事精神由衷感佩，謹代表本所同人向她們致謝。

杜正勝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
周年紀念文集 / 杜正勝, 王汎森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民 87

□；公分

ISBN 957-671-608-X (精裝). -- ISBN 957-
671-609-8 (平裝)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歷史 2. 史
學 — 中國

619.2

87012753

目次

上 冊

序	杜正勝	i
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		
史語所的創立	杜正勝	1
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	陳 槃	43
憶傅斯年先生	孔德成	53
從張、傅往來書信看張元濟與傅斯年暨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關係	周 武	55
史語所第一任所長傅斯年老師	楊向奎	73
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	顧 潮	85
趙元任和史語所	卞趙如蘭	95
一九四九年前的陳寅恪——學術淵源與		
治學大要	陳弱水	103
劉半農與史語所的「民間文藝組」	王汎森	119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	石璋如	135
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		
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枚、余錦泉	王道還	163
蔡元培與史語所	潘光哲	189
胡適先生與中研院史語所	歐陽哲生	217
陳垣先生與中研院史語所	陳智超	233
史祿國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學風	劉克甫	239
憶李方桂先生	周法高	251
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	李 濟	261
董作賓學術述略	鍾柏生	277

羅常培先生學術述略	劉 堅	295
羅莘田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羅慎儀	305
從徐中舒的治學看史語所的學風	唐嘉弘	311
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	陳 力	319
記容希白師治學及待人之道	李 瑾	331
容肇祖與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汎森	345
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	石璋如	353
郭寶鈞先生的考古事蹟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	鄒 衡	367
丁文江與史語所	潘光哲	379
中國建築史之父梁思成院士與史語所	黃銘崇	401
鄭天挺先生與史語所	鄭克晟	415
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	杜正勝	423

下 冊

寫史正壯年——傅樂煥在史語所的日子	黃寬重	441
皓首窮經——陳槃庵先生小介	楊晉龍	455
師門識略——槃庵先生側記	陳鴻森	457
幾篇重要文字概述	勞 幹	461
李晉華與《明實錄》	王汎森	467
李光濤先生行述	周天健	475
俞大綱先生與史語所俗文學資料	曾永義	481
回首來時路	全漢昇	487
從「以書為本位」到「歷史問題」的探索——		
陳述在史語所時期的學術發展	陳雯怡	495
我在史語所的十年	張政烺	533

王明與歷史語言研究所	葛兆光	539
史語所一年	周一良	553
于道泉先生小記	王邦維	559
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 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	馮 蒸	565
一代語言學巨人——懷念丁聲樹先生	金有景	585
我對史語所的回憶	吳宗濟	605
工作即生命的董同龢	王守京	613
「啊，門——」緬懷周祖謨師	魯國堯	619
田野考古第一——吳金鼎先生	石璋如	631
我在史語所	石璋如	639
劉燿先生考古的五大貢獻	石璋如	655
考據與史料——胡厚宣先生治學與 史語所的傳統	胡振宇	663
通才考古家高去尋	杜正勝	677
夏鼐先生行傳	石興邦	709
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	李亦園	737
芮師逸夫先生最後的心願	桑秀雲	747
芮逸夫先生的學術成就及貢獻	宋光宇	749
韓儒林先生與元史、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進步	陳得芝	759
達欽立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王汎森	773
我在史語所的三年	楊志玖	783
李莊憶舊	王利器	791
王叔岷先生學行簡述	鍾彩鈞	811
李莊板栗坳·史語所——我終生懷念的地方	何茲全	819
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	周世箴	827

歷史的足音	馬學良	863
懷念我們的朋友楊希枚先生	楊寧蓀	877
屈萬里先生的治學與史語所	屈費海瑾	895
我與史語所	李孝定	909
學習甲骨文的日子	張秉權	923
嚴耕望先生與史語所之學風	廖伯源	933
我所認識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田意	943
我在史語所任職二十三年的回顧與瞻望	吳緝華	951
南港述舊	許倬雲	965
史語所、李濟先生與我	張光直	971
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		
憶史語所學習研究的日子	張春樹	975
我在史語所的研究	陶天翼	993
冬涼夏暖話當年	陶晉生	997
在史語所的那段日子	吳文彬	1001
史語所遷南港的第一倉庫	陳仲玉	1009
我與史語所	賈士衡	1015
猶有沃土長養華采	林英津	1021
徘徊在史語所門外	李亦園	1027
劉子健先生與史語所	黃寬重	1035
史語所與劉子健先生	柳立言	1039
我與史語所	饒宗頤	1043
對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些個人回憶	田 浩	1049
英文目錄		1053

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 史語所的創立

杜正勝^{*}

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後三個禮拜，傅斯年致信陳寅恪說：

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史語所檔案」，元字9號之1，以下簡稱「所檔」）前句道出歷史實情，後句反映傅先生創所任事的一貫作風。

傅斯年創立史語所，不論治學的態度、方法、目標和組織，都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樹立一個新典範，也替中國爭取到世界性的學術發言權。傅斯年怎麼會想到要辦這麼一個研究所？一般多說他留學德國，深受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響。但他一生只提「蘭克」二、三次，藏書中沒有任何蘭克的著作（王汎森，1997，Wang Fan-shen 1993，p.95），向來的

^{*} 中央研究院院士

通說恐怕不必然多麼可靠。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不過，但從他離歐返國前夕的資料來分析，探求當時他主要思索的問題，對這個爭議也許有些啟發。

傅斯年負笈歐洲，首先三年半在倫敦大學，然後轉赴柏林大學又過三年，於十五年（1926）的秋天束裝返回中國。歐洲六年半的遊學生涯，他大部分的時間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在內的自然科學，有數學、化學、物理和統計等。傅去國半年多時，寫信給胡適，感嘆北京大學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1920.8.1，《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三七，頁 349，以下簡稱《秘信》）。這種心態留歐期間大概沒有大改變，直到十四年（1925）給顧頡剛的信還說自己「不弄史學」（「傅斯年檔案」V:115，以下簡稱「傳檔」；又《傅斯年全集》冊四，頁 457，以下簡稱《全集》）。他雖然留下不少檔案資料，片紙隻字幾乎巨細靡遺，但我們只知他在柏林大學的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文（參王汎森、杜正勝 1995，頁 52-53）。

一個史學圈外人進入史學領域內，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所要挑戰和超越的是什麼對象？對傅斯年來說應該是很具體的，活生生的，而非不痛不癢地移植什麼蘭克史學。三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會」，我從傅斯年與顧頡剛和胡適的關係，分析他的史學革命，提出「從疑古到重建」的看法（杜正勝 1995），現在續論他所創建的史學革命的基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應從顧頡剛和胡適說起，因為對這兩人的評論是傅斯年以「不弄史學」之人而終於在史學王國引領風騷的關鍵。

一、破繭而出的新天地

話要從民國十五年（1926）秋天說起。這年七月下旬，與他睽違將近七年的老師胡適也到歐洲，由英而法，在巴黎研讀敦煌資料。傅斯年自柏林赴巴黎與胡適相會，他知道胡在中國甚忙，難得說上幾句話，這次是最好的機會。八月十八日先從柏林發一長信給胡（《秘信》冊三七，頁 356-360），九月一日師生巴黎相見，聚談三週。傅的長信談論他的學術觀點，其畢生志業大抵都可在此信追尋根源，但胡適似乎不太能領會；有些需要細述詳申的地方，留待面談，善寫日記的胡適也不能詳記（《手稿本胡適的日記》冊五，1926.9.2）。該信中傅斯年有些話語狀似消極，譬如說他這幾年「離群索居」，「懶得世上無比，書信、生活一切廢棄，文固不寫，書亦未讀。」他在柏林與「寫中國人之電影打吵，找人，作文，催使館」，但所「與聞的都是沒有登報的價值。」甚至說，「北京師友總以為我是閉戶讀書，言之可歎。爽信我回國後，作一糟文，大大的 demonstrate 我之不才于朋友，免得長期的擔負這個不能如期之雅望『如芒在背』的苦惱，不亦樂乎！」這一類近似自暴自棄的話，可能在與胡適面談時也有所流露，致令胡適「感覺失望」，認定「孟真頗頹放，遠不如頤剛之勤」（《手稿本胡適的日記》冊五，1926.9.5）。

傅斯年與胡適在巴黎分手，從馬賽買棹東返，十月底抵達香港。當時廣州是革命根據地，中山大學採委員制，委員有學者朱家驊（次年改組，任副校長），顯得朝氣蓬勃（胡頌平 1969，頁 16-18）。當年十二月傅斯年應聘為中大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朱家

驊 1951），開始他一生轟轟烈烈的學術志業。先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久說服蔡元培在剛剛籌備的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連串生龍活虎的做為，比起十五年八、九月間他給胡適的「頹廢」印象，判若兩人。前後相距不過一年，就有這麼大的轉變，是何緣故？

其實胡適對這位高深莫測的學生這次是失察了。我們沒有他們師生在巴黎暢談的記錄，單就柏林長函而言，雖有上述狀似消極之語，但那是傅斯年一封揭示畢生志業的信，或明或暗地表示他已有別於顧頡剛的路（參杜正勝 1995），我們可以稱做〈與胡信〉，以別於另一封給顧頡剛的長信，後者可以稱做〈與顧信〉（「傳檔」V:115），二者是關係傅斯年史學思想成形的第一手史料，可以互證。

原來傅斯年自十三年（1924）起與顧頡剛書信論學，但信皆未發，所以也沒有顧的回應。及傅在巴黎與胡適暢談後，一時興起，重新抄錄，並且有所修訂，船到香港，共抄了四十紙，才寄給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顧頡剛。但原信稿還剩十多張未抄，準備到上海付郵，卻一直未寄出，原稿亦不知下落。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後，顧頡剛受傅斯年之命，編輯《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未經傅的同意，把這封長信分作兩個題目分期發表，即〈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繫」〉和〈與顧頡剛論古史書〉。承蒙顧潮女士惠寄長函影本（編入「傳檔」V:115），可以校正刊本的一些錯誤，從眉批也可以推定一些觀點形成的時間。然而傅斯年歸國經年，未完信稿雖經顧屢催而始終沒有再整理，這是顧頡剛編按所說：「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全集》四，頁 493）能完全解釋的嗎？

上面說過，信起寫於一九二四年正月二月間（據傅眉批），先評丁文，第二部分與顧論古史已在一年之後，但都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才抄成正本。與顧相關部分，原稿與抄本相隔雖然不到兩年，傅斯年的想法卻發生極大的變化。開頭說，顧頡剛與人論戰，「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這段起首部分批評李玄伯，李文發表於十三年（1924）年底，傅在柏林能讀到，應該不早於一九二五年。此時的傅斯年恭維顧頡剛，稱他為史學之王。然而到重抄舊信時，傅斯年已經變了。不過就傅來說，既已寫過，也公開談過的想法便讓它存在，現在雖然意見不同，繫於舊友之情，仍然把舊信寄出，故說「竊自比于季子挂劍之義」。劍是挂了，不過傅請顧「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傳檔」V:115，頁1）。這些話是一九二六年重抄時寫的序言，顧頡剛接到信，置序言於不顧，也不論如何理解，秉持「該把自己想到的意思隨時發表」的原則，便在《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發表。但「傅先生見之，終不以爲可」（《古史辨》冊二，下編，頁301，顧頡剛十九年四月編按語）。

所謂時移勢易，當年深悔受乙部之誤，不弄史學的傅斯年回國不久，不但在中山大學創辦一個新研究所，而且又從中大準備移師中央研究院，創建另一個更重要的研究所，豈再是昔日吳下阿蒙乎？兩三年前在顧頡剛「史學上稱王」的氣氛籠罩下的傅斯年，要向北大舊友顯示不才的傅斯年就此告別了。最關鍵的是，傅斯年不論在自己心中，而且在客觀形勢上，已完全超越「顧氏王國」，另有自己的天地了。此一新天地是怎麼形成的？大概在什麼時候？